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六三期 ——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10c)

【岁月无情】	从宝塔尖到逍遥派——北京大院干部子弟的文革	尹敏志
【往事追忆】	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选载之一)	米鹤都
【春秋史笔】	“贵族学校”的“流氓教育”	余杰
【不堪回首】	评“青春无悔”	裴毅然
【往事非烟】	辽阳十年	谢定国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岁月无情】

从宝塔尖到逍遥派——北京大院干部子弟的文革

• 尹敏志 •

几乎所有与文革有关的影视文学作品，都绕不开大字报、红宝书、批斗“牛鬼蛇神”等典型元素，但姜文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却将之一概摒弃。明明是拍摄十年动乱，导演回忆的，却是捉弄老师、追女孩儿、偷看内部色情电影等个人体验。而且这一切，全由明亮到几乎都曝光过度的镜头来呈现。这种南辕北辙的荒诞感，在电影刚开始的旁白中便很明显：“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了，使我眼前一阵阵发黑……”

如此颠覆性的文革叙述，却绝非编剧王朔和导演姜文的凭空捏造。在文革的某一个特定时期，京城里确实有一批年轻人，过着与电影中的马小军和那帮“坏孩子”们类似的生活。他们主要是当时北京地区的大院干部子弟，尤其是军队干部子弟。但他们的特殊经历，却被充满了血泪与控诉的主流文革话语给掩盖了。和姜文的电影类似，叶维丽、马笑冬的对谈录《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也是从亲历者的视角，还原大院干部子弟的文革岁月，在很多方面，和电影可以相互印证。

“大院”是1949年后才在大陆出现的一种全新居住形态，其共同特征是封闭、自成一体，“体现了共产党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改造”。它最早起源于延安，解放后被带入全国各城市。大院对成年人而言，几乎就是边沁（J. Bentham）式的“圆形敞观监狱”（Panopticon）：即使回到家，同事间仍处于相互监督之下，稍有不慎，便可能成为别人的把柄。但孩子们的大院则是乐园：他们从小在院里成帮结伙，“呼啸而过，打打杀杀，有玩不完的游戏”，红卫兵运动爆发后，他们就自然结成了最团结、战斗力最强的派系。所以叶维丽认为：“要研究文革早期的红卫兵运动绝不应该忽略大院，红卫兵的中坚就是大院的孩子。”

通常只有中下层干部及其家属住在大院里，“真正的高级干部是不住大院的，他们住胡同里的独门独院”。但同时，大院居民又比胡同里的“老北京”高出一等，能享受到后者所享受不到的图书馆、食堂、医院等公共服务，以及高人一等的物资配给。尤其在三年饥荒时期，口粮配给上的差异显得更加明显。马笑冬回忆道，1960年她曾在街上遇到饥民索要她手中面饼吃，吓得心怦怦直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讨饭，觉得这种事不该发生在我们的社会。”

新华社大院的叶维丽从小“看到的世界，就只有光明”，直到升入小学后，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同年级里高官子弟云集，学校的孩子们“对家长的地位和级别特别敏感”，连“什么级别的人坐什么车”都一清二楚。在这样的环境下，叶维丽开始有了自卑感：开家长会时，看到别人坐小汽车、前呼后拥而来的家长，再看看自己只能步行来开会的父亲，她不禁从心里感叹道：“我真希望他也能坐车来。”

1949年之后，不论是用独院、大院和胡同三种居住形态划分居民，还是用悬殊的工资、待遇等级差别将干部分成三六九等，既是中国官本位传统的渣滓，又是革命斗争的遗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理想虽崇高，但在实行过程中，却只有严格规定上下尊卑，才能保证命令逐层向下严格贯彻，使整个组织高效运作；细密的等级划分，又能使干部对于自己付出和回报的关系更为敏感，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工作热情。

1964年前，社会等级制虽然确实地存在，但尚无人敢挑战“人人平等”和“劳动最光荣”的观念。所以就连高级干部对自家的保姆，都必须以“同志”互称，非常忌讳盛气凌人。但自从1964年6月“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被提出来开始，“家庭出身”开始赤裸裸地凸显。从1964年到1966年的“前文革时期”里，“革命干部子弟”成了最优越的出身。马笑冬说：“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的意识”，有了一种“优越感”。原本自卑的叶维丽，也开始喜悦地发现：“做‘人上人’毕竟是一种不坏的感觉。”同时，“大讲出身的结果就是圈子越划越小，干部子弟内部又无形中分普通干部子弟和高级干部子弟”。社会的裂缝，已经无法再掩饰了。

正如康德（I. Kant）所说，一个社会存有某些道德的假象，总比连假象都没有好，因为虚伪的存在，说明强者对弱者至少还有所顾忌：“这种德行的假象，也许最后会真的一步步唤醒德行”，所以虚伪其实“不是欺骗，而是我们自身中的无害的幻觉”。一个虚伪的社会往往不至于太坏，什么时候连虚伪都消失了，才是真正可怕的时候——1964年后，对于阶级性的过分强调，使得公孙龙“白马非马”式的悖论深入人心：“地富反坏右”的属性可以使一个人自动丧失其为“人”的地位，所以“不但可以见死不救，而且打死也是死有余辜”。

要理解文革初期官方文件和各类政策的自相矛盾与前后抵牾，必须认识到：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虽然是全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权威，但在政治上却还处于“退居二线”的状态，真正主持工作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所以，1966年5月16日标志着文革爆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虽是毛泽东的旨意，但政策的具体执行却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从那天起到7月29日，是文化大革命中气氛最诡异、各方角力最激烈的“工作组”时期。

工作组时期，务实派刘邓延续了之前“反右”“四清”等政治运动的惯例，由党委派工作组进校，“好好控制运动，维持好局面”。不但没有实施《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要求，反而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原本的官僚等级制。此时“并没有太多青少年‘自发’表现的空间，因为工作组强调‘文革’要在他们统一领导下按部就班的进行”。

叶维丽回忆道：“工作组时期我们每个班都有一个‘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差不多都是班里父亲官儿最大的，这种倾向在年级负责人里更加明显。”此时，住独院的高干子弟当仁不让地成了运动的领导者，住大院的中下层干部子弟则暂时靠边站：“文革一开始，就是看谁家官大，谁大，谁就是人物。这一点就让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运动，是她们（高干）子弟的运动。”

但这种情况没有延续多久。7月18日，毛泽东忽然从南方返回北京，6天后决定撤销工作组，29日，中共中央便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了这一决定。解散工作组是毛泽东夺取文革绝对领导权，使“政统”与“道统”在他身上合一的第一步。深谙权术的毛，同时又巧妙地保留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二人的职务，避免给人留下过于咄咄逼人的印象。这种柔性手腕效果很明显：在29日撤销工作组的会议上，刘少奇公开承认错误：“文革怎么搞，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晓得。”

不急于攻城略地，而更注重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毛在文革初期的党内路线斗争中延续了自己军事思想的精髓。从7月24日到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颁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段时间，可称为文革的“再发动时期”。这段时期，原本受“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得到了解放，“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青少年登上了历史舞台”。

若仔细分析《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这两份文革初期的纲领性文件，便可看出情况已发生多大的变化。《五·一六通知》总显得底气不足，欲言又止：“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问题”，“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但到了《十六条》时，语气便已斩钉截铁：“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更是迅速把运动推向全国。

叶维丽对文革“再发动时期”的感觉是：“8月上、中旬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形势变化极快，‘一天等于二十年’，有时上午、下午的形势都不一样。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红卫兵运动一轰而起。”上层政治风云突变，下层红卫兵运动也在激烈震荡。就在7月29日解散工作组当天，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干部子女便贴出了著名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血统论”的横空出世非常耐人寻味，它诞生于毛泽东重新掌握中央权力之时，但却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毛泽东的思想。此时干部子弟的处境，非常像南朝的门阀士族：唐长孺在研究公元5世纪南朝宋、齐的门阀制度时发现，正是在传统门阀士族地位下降、寒门地主地位上升之时，高门士族们“不得不深沟高垒，严加堤防”，创造出“清流”、“浊流”这两个概念，把自己和新贵们分别开来，“以保护自己的权益，阻断寒门上升的途径，企图表明法令认可甚至皇权直接干预也不能代替和逾越士庶区别的传统界限”。同理，对于政治风向极为敏感的干部子弟也正是在地位受到威胁时，才悍然抛出“血统论”来抵抗红卫兵运动正向底层蔓延的趋势。

这一做法达到了不错的效果：从1966年8月8日到当年年底，可称为“干部子弟领导期”。这一时期的红卫兵运动，主要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干部子弟由于其高贵的出身、对政治动

态的了解，以及身为“革命接班人”的自信，使他们成了运动当之无愧的“宝塔尖”。虽然这一时期遇罗克的“出身论”也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根本上无法动摇“血统论”的霸权地位。

干部子弟们最恐惧的，就是他们的父母一夜之间也被打倒，成了专政对象。因为这会使他们自动跌出革命接班人的行列，堕落为“非红五类”——原本荫蔽他们、带给他们自豪感的“血统论”，马上露出“以理杀人”的狰狞另一面。尤其在大院里，这个“有点儿什么事能传得人人都知道”的居住空间里，世态炎凉表现得更加残酷：叶维丽的父亲被打为“反革命、黑帮”后，她马上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指指点点地说我”，“街道上的小孩就欺负我妹妹，吐口水啐她，扔石头打她，那时候她才六七岁”。

而随着包括刘、邓在内的一大批中高级干部相继被打倒，终于“到了1966年底，老红卫兵衰败了，红卫兵组织变得五花八门，什么人都能参加，是不是红卫兵不足以区分人了”。革命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到了这个地步，在各自学校丧失领导地位的大院子弟们不得不重新组织，化零为整，“开始越来越多地在一起活动”，“这样的群体活动多少减轻了家长出事对孩子们带来的冲击，使日子好过一些”。大院文化在这一时期开始走上街头。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的那帮大院“坏孩子”们，本来被分在不同的中学，大致就在这一时期重新组织：“本来分开了的好哥们儿，又相聚了。”

必须注意的是，文革时被打倒的，多是行政干部；但由于中央“军队不能乱”的指示，军队干部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所以“这时候大院文化应该主要以部队大院为主，因为地方干部子弟的家庭差不多都出事了，他们不太‘狂’得起来。部队干部受的冲击小，他们的子弟‘气’仍然比较‘盛’”。

大院干部子弟红卫兵从小生活在一起，本来就比分散居住的平民子弟红卫兵团结得多。除此之外，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青少年发育期时，干部子弟有相对充足的食物供应，甚至肉、蛋等“奢侈品”，这就使得他们普遍比平民子弟高大强壮。更为重要的是，干部子弟与官方、军队毕竟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可以得到更为精良的武器装备，信息渠道也更为畅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正是这些因素，在文革后期长期维持干部子弟之地位于不坠。

姜文电影中的一个场景——卢沟桥铁轨下的未遂武斗——反映了这一点：敌方的平民子弟红卫兵虽黑压压一片，却看上去气势不振，清一色的灰蓝工装、木棍和国产自行车，基本为冷兵器时代的低级配备；马小军在内的军队干部子弟，却人高马大，穿着象征身份的军绿色上衣，手持钢叉、匕首、原版和改装过的霰弹枪等武器，甚至有车牌号为7-2866和7-2867的两辆军用卡车。不难想象，若真的开打，精锐且骁勇善战的军队大院干部子弟，无疑会给平民子弟红卫兵造成极大的杀伤。

从1966年底到1968年底，可称为“后干部子弟领导期”。老红卫兵的衰落，几乎是必然的，因为毛发动文革的本意，便是推翻已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官僚阶级，借助青年学生的新鲜血液，恢复党内已被腐蚀的革命传统。这一任务，怎么可能由官僚阶级的下一代来完成呢？但在1966年夏，大部分人对于文革还将信将疑之时，暂时先起用态度最积极的干部子弟，乃是一种权宜之计。待到全国革命青年都被发动起来之时，便可弃“老红卫兵”如刍狗了。

于是在1966年冬，干部子弟们“终于发现，革命不仅不再是他们的特权，而且他们的家庭也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中间有些人产生了很强烈的被利用的感觉”。他们成了“逍遥派”，或者“天桥打场子的”：“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为文革造了声势，现在‘场子’打出来了，他们也没用了。”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联动”等反文革组织开始出现，“很多老红卫兵从运动

初期的宠儿变成了反对派，公开和中央文革捣乱”，质疑文革的正当性。

文革的第一批幻灭者、清醒者、反行为者，就这么在北京出现。没有了父母的管教，失去了革命的冲动，“从极端革命到颓废堕落也挺自然”。老红卫兵们此后过着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偷窃、读禁书、弹吉他唱歌、四处游荡；男孩披上父辈华丽的将校呢制服，女孩则穿起不久前他们“破四旧”时抄来的欧式白纱裙；北京最高档的西餐厅“老莫”，成了他们最钟爱的聚会场所；“拍婆子”在马小军、米兰、刘忆苦、余北蓓们之间盛行，禁欲主义已被完全抛弃——“18岁是和青春、和性成熟联系在一起的”。这既解放又禁锢，既反叛又保守，既“阳光灿烂”又“一阵阵发黑”的岁月，直到1968年冬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开始后，才终于戛然而止了。

〔本文参考了叶维丽、马笑冬所著《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 原载《领导者》杂志总第56期（2014年2月）

~~~~~

### 【往事追忆】

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选载之一）

• 米鹤都编撰 •

#### ◇ 风起于青萍之末

文革前夕，人们的思想状态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中苏论战开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危机。这场论战是非常公开的，中共方面采取连发九篇社论的形式，指摘苏联搞修正主义。所有的人都看到，中国和苏联翻脸了。这对我们的触动很大。在我的印象里，从上高中以后，战争的危险似乎就在眼前。我们很敏感地认为，与苏联的矛盾有可能最后导致战争，我们对此有很强烈的危机意识。这种外部环境和国内的政治环境结合起来，就好比是一个加速运动，像小步快跑，越跑越快。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有些传统的东西慢慢就被甩掉了。一切事情的焦点、重心、敏感点都集中在阶级斗争上了。这种理论笼罩了我们的整个头脑，后来的说法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也就是说，人们的思想已经被这种理念统治了。

我觉得无论在国际国内，毛泽东由思想运动到政治运动，由党外到党内，由国内到国际，推动着斗争进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认为这个党起码在基层很多地方都烂掉了，在高层又有许多老同志与他志不同、道不合。而他采取的对应措施，就是斗争哲学，“与人斗，其乐无穷”。上面说到“四六八学潮”（5）时谈到，发动学生闹事，我看就是他推动的。我们听到的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与王海容的谈话，在青年学生看来，无疑具有很强的煽动性。

文革前夕，在我身边，已经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其实我们家里也有类似的议论，但我父母他们比较规矩，不给我透露这些小道消息。但重要的问题，他们会让我注意。比如中苏论战，我父亲就非常重视，让我一定要认真读“九评”。另外，我父亲和康生有很深的渊源，解放前都从事过情报工作，建国后关系也很好。我和弟弟第一次去北戴河时，父母因为工作忙去不了，就把我们寄放在了康生家里。我们把他的夫人曹轶欧叫曹妈妈，显得很亲切。其实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一些迹象性的东西就是从康生那里来的。在文艺战线，这种迹象和意向也越来越明显。比如一些文章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批判文学作品、电影啊，很早就开始了，《槐树庄》、《夺印》、《千万不要忘记》等作品也都出来了。这就是文革前夕的政治环境。

我记得1965年，曹轶欧的外甥苏涵写文章批判《早春二月》，其实就被授意的。我的印象中，除苏涵写文章那事以外，康生还煽动说：你们这些学生也要关心文艺，要注意有人反党啊，也可以写些文章啊。这些可以说都是有风气之先的。我的思想当时肯定也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从我的感觉，就是中央要做些事情了。因此，文革的发动，对我而言，并没有感到非常吃惊，好像是顺理成章下来的。当然其内涵是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四中高三（5）班和女一中高三（1）班给中央写信要求废除高考的事儿，是文革初我经历的第一件大事。说起来，这又是高干子弟得风气之先的例子。四中高三（5）班就是我们班，是薄熙永先听到消息，知道了1966年的高考可能要停下来了。当时，我们还都在积极准备高考，不管四清运动也好，革命化教育也好，不管我已经身为预备党员也好，是先进分子也好，我的精力全部都集中在准备高考上。我们有个数学老师叫周长生，有天在他家里给我们补课。参加补课的人有我、薄熙永等几位，印象中好像是几个干部子弟。周长生老师主要给我们讲一些历届高考题里的难题和习题。补课当中，薄熙永把这个消息讲了出来。他说：现在中央有这个决心，咱们是不是也要表示一下、呼吁一下呀？咱们争取主动啊。干脆发起废除高考的倡议，中央一定会接纳的。我也同意了。不过，女一中是怎么回事儿我不清楚。

社会上把这说成是四中高三（5）班的罪过，提出废除高考，使中央不得不接受。不是那么回事儿，实际上是中央已有考虑，我们不过得了风气之先，做了这件事情。高干子弟干事情，总弄出这个风气之先来。我们那封信是有背景的，不是自发的，而且我个人还有心里深处的一种遗憾。我是觉得我们备战高考了许久，摩拳擦掌，准备一显身手一决高低。那种心理上的荣誉感，认为考试是对自己的一次检验，这劲一下子使不上了，很失落。那时，班上学习成绩差一点的同学高兴得要死，这下子解放了，以后上大学就不用考试了。但残酷的事实是，以后连大学的教育都停止了，结果是什么也没有了。

接着工作组来了，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地位，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四中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校文革）主任。在这个问题上，四中出过一个干部子弟争夺领导权的事件。有几位高干子弟和我们有些矛盾。他们认为我代表的这批人是策略派，比较保守，因此不应该由我来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我们晚上在大教室里，还开了一个（内部）主要有干部子弟参加的会，展开辩论。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具体内容了，可能是关于当时如何开展运动的一些做法。他们一方认为我们做得不对，认为我们保守，也觉得我老是当学生领袖，也该换换别人来领导了。我们提出要讲政策，要按照《十六条》的精神办。而且我当时有点欲罢不能，某种意义上是不由自主地被架在那个位子上。

工作组组长当时非常紧张，因为这两方面都有来头。以我为首的是多数，四中的学生党员基本都在里面，而且拥护我们的有一大批学生，在学校里很有影响力；另外一方的那几位则颇有背景地位。后来，外边把这叫做四中干部子弟内部的一次“争权夺利”，至少旁边的人是这么看的。这件事大约也就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工作组撤出学校后不久，就不了了之地消解了。

工作组从各个学校撤出后，学校就出现了权力真空。文化革命委员会由于是工作组主持成立的，几乎就失去了权威性。这时，我提出来用年级支部的方式掌控局面。每个班都有团支部，在各班团支部基础上产生年级支部，由各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参加。在学校层面，由高三年级的年级支部负责。高三的团支部书记大多是党员，高三（2）是李三友，高三（4）是秦晓，高三（5）支部是我，也就是我们这几个学生党员在起主要作用。四中的各年级支部之上，再有一个联合的机构，我是负责人。我那时是校团委的学生副书记，书记由老师担任。实际上，高三的年级支部就控制着全校的文革运动。再有，就是利用以前的辅导员制度，由高中的学生负责辅导初中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的指导思想就是：一个大的运动已经来临，根据四清中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一定要有序、有组织地进行。而我们是这个条件的，我们年纪相对成熟，

又都是党员。这种结构，在当时北京的中学里可能是独一份。

我在文革中，不是像北大附中彭小蒙、清华附中卜大华那样通过造反，自己冲杀出来的；也不像我们原来四清运动中那几位高年级学生是挑头“闹事”的，而我是自然产生的一个学生领袖。对我来说，当时就是这么一种状况。也有人想当什么头儿，但我其实不是这个想法，就是形势把你架在那儿了。一成立学校文革委员会，我就是主任。一成立年级支部，我就是负责人。面临群众运动，你跑不掉，就得出来做事情。所以我说，我在文革初期的作为很大程度上是身不由己，这是我的宿命。

#### ◇ 批斗校长老师

我们在文革中的表现，简单说就是经过“四六八学潮”之后，我们这些党员学生的行为很像政工干部。从我个人来说，我的思想轨迹，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在组织的关心下成长。家庭教育也是这个要求，不能违反组织原则，不能违反政策。因为这种思维惯性，在“四六八学潮”中我没跟上，落在了后面。正因为我落在后面，结果被人说是妥协、投降。又因为“被招安”，所以我就入了党。再因为我是学生党员，我就更加注重组织纪律和中央的政策。在这样一个因果循环之下，到文革初期，我们就格外强调组织领导，强调政策。脑子里一面是跟着主席，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面是要讲政策，强调组织和有序。我觉得革命就革命，但不能乱来。我们经常学习和研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尤其对政策性的问题比较敏感。其他那些学校的学生，人家谁管《十六条》是干什么的。文革时揪斗老师，有些学生上来就打。因为我阻止了一些过激行为，又被人说成是策略派、保守派等。

关于四、六、八中在中山音乐堂批斗李晨、杨滨的事情，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陈小鲁口述史〔6〕说是他提议，找我商量，那可能就是这样。因为我是四中的头儿嘛，几个学校要联合安排这些事情，一定会和我们大家协调的。那次我肯定是在主席台上，应该还有六中的董良翮等。文革中用批判大会和群众发言这种方式批斗一些领导，在当时是很寻常的事情。我记不清那次有没有挂牌子，我印象中也没有，也没有戴高帽子。那时周坚是四中校文革副主任，他跟我年龄一样大，但因病留了一级，当时是高二的学生。他是一个行政能力很强的人，说话做事都很清楚。当时，他是根据我的要求，参与批斗大会的组织工作。如何上车，如何到达会场，如何布置维持秩序的人。

刘辉宣是高一年级的团支部书记，也参加年级支部的会议，但他很激进。他平常就和我们较劲儿，觉得我们保守，看着我们不顺眼。那次开会，因为他是参加年级支部的人，周坚还特意把他安排在主席台上维持秩序。谁知他在开会中却第一个动手打人，我不记得打的是谁。〔7〕我们确实没有想到刘辉宣这么凶猛。台上当时一下就乱了。我们急忙阻止打人，维持秩序。但是已经有很多低年级同学蜂拥而上，冲上台乱打一气。我只记得李晨花白的头发，被皮带扣打到头上，流着血，看着很惨。后来我们只好把大会停了下来，把批斗对象都带下去，就散场了。

我后来为此批评刘辉宣，我说：你那就是一种过激的行为。这次批斗会的结果，绝对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也不允许这样做，因为它严重违反政策。那时已经有了《十六条》了，不能搞体罚，不能打人，很明确。但是在党的历史上，不乏一些勇敢分子，他们不具备有组织地进行斗争的能力，但是生性鲁莽，崇尚暴力，具有破坏性。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在学校里，突然一群学生就把杨滨围起来了。我们正在开会，有人报信：出事了，杨滨被他们押到操场的跑道上去了！我赶紧把会停了，说快走。过去一看，杨滨已经被连打带踢，衣衫不整了。我说：大家不能这样，要有秩序，要按照《十六条》办事，可以批判，但不要动手。这些学生要求游街，我和赵胜利就架着杨滨，边上还有秦晓等人，在

操场上转了一圈。这过程中，我身上也挨了好几下，当然还不算狠。因为这些学生也不敢真惹我们，我们翻了脸也不客气。由于我们在旁边，火力马上就弱了，扔点土疙瘩、泼墨水什么的，没有多少杀伤力。原来都是用皮带抽、木棍打的，那后果不得了，我想老太太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杨滨对此印象很深，她后来对儿子宋新鲁说：孔丹救了我一命啊！要不是孔丹、赵胜利他们，那我这条命就没有了。（8）

四中还有一次突发事件，发生在四中的小院里，也是一帮学生突然就斗起了老师。我听说后，就赶紧赶过去了。当时在场的大多是初中的学生，可是这些初中的学生很凶。他们点着名地叫，x x x 上来！点一个老师的名字，就往台上拉一个，拉上来一个就剃一个阴阳头，剃完一个就往“牛棚”里送一个。下面的老师们都吓得哆嗦，眼见得上一个就是一剪子，一推子。点了名、被推了头的老师，已经站在那里好几个了。我看见后就赶紧上台，给大家念《十六条》，不准再斗。告诉他们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很不客气地批评他们不能用这种方式对待老师，有什么缺点错误可以批评批判，但不能用这种侮辱人的方式。后来有的老师说：当时我的心都揪到嗓子眼了，知道快轮到我了。你孔丹当时能这么站出来，不容易啊。那年头，有些人进了牛棚就出不来了。我讲了一通后，这些老师就没被关押。

在当时那种潮流下，想到去保护校长、保护老师和同学，并不是偶然的做法，而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努力要去做的事情。像我们班的老师顾德希等，对我们来说是亦师亦友，很早就被我们给保护起来了，根本不让别的学生碰。我们好几次，就是直截了当地保护校长。批评可以，批斗也可以，批她过去执行错误路线什么的都行，但是不准动手，不准打人。所以四中就始终没人敢像在师大女附中那样，像在八中、六中等学校那样，在场面上就公然噼里啪啦动手打老师。四中始终没有，没人敢，因为我们的权威在这儿摆着呢，我们压着台呢。文革后的1982年，我到张劲夫那里做秘书，中组部要审查我文革中的表现。他们到四中请当年的老师们开座谈会，老师们都明确地表态说孔丹讲政策。

说来说去，这不是说我个人如何如何。因为我在那个地位上，这些事很多只是通过我个人表现出来的。在四中是有这么一个集体，是在这么一种共同思想认识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也不是要标榜我们有多正确，只是说这样一群人在那样的背景下，是怎么反应的。在左的大背景下，我们也是起来造反的，从四清开始就起来批判修正主义，比如周孝正的“21条”被我们作为典型进行了批判。文革中也组织批斗了校长和教育界领导。不过，我们的批判不是采取一种有组织的暴力行为。

所以有些四中低年级的学生后来对我及我们这一批人不堪忍受，他们跟我们闹，说我们站在了革命和斗争的对立面，“你们就是不能像红卫兵运动那样发展，我们受到了你们的压制。”大字报也出来了，给校文革委员会提意见什么的。

#### ◇ 被动成立红卫兵

文革初期，我对红卫兵的兴起是有看法的，认为过于激进了一点。王铭是我初中的同学，高中去了清华附中，他也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那时，我还专门到圆明园找他谈过。他说他们要成立一个什么组织，这在我看来是过激的，至少是不妥的，我坚决反对。我说：你搞什么组织啊？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路线嘛，你就按中央的指示做呗，按中央的政策要求来推动。从当时我们之间的关系来讲，我的心态和口气是比较居高临下的。我说：你们根本就不能这么做，就我们在学校里参加四清运动的经验，一定要在组织的领导下，要靠党的领导。当时中学生的斗争矛头基本上都是对着学校党支部的，但是只是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倾向，批判十七年来教育路线的问题。这完全是可以有序进行的嘛。虽然我对他们有一定的理解，像王铭说的：我们受压制，工作组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和他们斗。我劝他



们多沟通，不要采取这种方式。不过，当时他们已经听不进去了。

四中像我这样的，不是一个，是那么一批人。我们作为能够掌控四中文革运动的这批人，在思想上是不接受红卫兵的，认为它是一个非组织的行为。实际上，我们对于当时海淀区学生比较激烈的做法也很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像以往中央推动政治运动所需要的那种组织。所以，我在内心深处是抵触红卫兵的。甚至我多少有一点点认为，我们这些学生党员所代表的四中学生的水平，和海淀区这些起来造反的学生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我们更有政策水平，更了解党的意图和党的安排，更能有计划地推动这样一个有序化的运动。上面派工作组，我们就听工作组的；上面有政策文件，我们就按政策文件办。我们当时的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我们学校从文革开始，运动都是有序进行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后来的四中红卫兵在造反的意识上，也远远落后于海淀区的这些红卫兵。这和当时不同学校的学生成份构成有关系，和学生群体中的不同思想积淀有关系。如果不是其后潮流的推动，我本人是反对成立红卫兵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视这种组织为革命运动中的“勇敢分子”。我今天说这话完全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这已经是久远的历史了。从一开始，在四清运动中和入党之后，我已经被一些同学视为保守派，我也知道是哪些人、有什么样的看法。但我对此不以为然，始终认为我走的路是正确的。就是坚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系统、有组织地开展运动。这不仅包括四清中解决基层领导班子是不是变质的问题，也适用于文革中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问题，至少我认为应该如此。

现实情况是，工作组一来，学校党支部就瘫痪了。工作组就是依靠四中的这些学生、依靠团组织进行领导。后来四中成立了学校文革委员会，我又是主任，周坚是副主任。可以说，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成立什么红卫兵。红卫兵这个概念，它和我们的思想主张，和我们的年级支部这种体系都不相符。

这期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不过开始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脑子里从来都是要听中央，实际上后来才知道，中央已经分裂了。或者说，中央本来没有分裂，是毛主席硬生生的把它撕裂了。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我还记得邓小平说了句四川话：“坐倒起讲”，意思就是坐下来讲。结果，毛主席突然从主席台侧幕处走出来了，带着中央文革的一群人，在台上走了一圈。你说毛主席走出来，少奇、小平能够不过去恭迎吗？这毛主席太厉害了，他就是不理人家，根本不和刘、邓讲话。他们表现得完全无助，一点面子都没有，再镇定的人也受不了。这些，下面坐着的人都看到了，这是个很强烈的信号。不过，我的反应还是有点迟钝，没有意识到中央已经分裂了，还是循着维护一个领袖、一个中央、一个组织的信念来考虑问题。

四中成立红卫兵比较晚，到“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我们还没有成立红卫兵呢。那天在天安门广场，我们从高年级每个班抽调了5到10个同学，在金水桥附近维持秩序。这时，四中还没有正式打出红卫兵的旗子，也没有袖章。后来听到扩音器的广播，要四中的负责人上天安门，我就上去了。（9）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充分肯定了红卫兵小将，局势明朗了。

从天安门回来以后，我们觉得不能落后于形势，于是在四中成立了红卫兵。刘辉宣当时批评说，我们没有成立红卫兵是落伍了。他这话虽然对我们有促进作用，但不是决定性作用。我们之所以成立红卫兵，主要是由于毛主席公开表态支持了红卫兵，我们就不能继续按照原来的想法做事了。红卫兵被毛主席肯定以后，既有整个大形势的要求，又有内部的压力，包括刘辉宣这些激进同学的压力，也包括干部子弟内部纷争中认为我们保守、妥协的批评，所以在四中，我用一个说法叫——“不得不”成立了红卫兵。

但是，四中红卫兵没有一个完备的组织体系，没有实际上的红卫兵总部，没有设红卫兵的运行机构，实际上还是利用年级支部、文革委员会，各个班的水文主任等这样的一些组织形式。可以说，红卫兵不是我们那个时期参加文革运动的主要方式。

当时，我们一方面必须要说自己是红卫兵，是革命的；另一方面又不能接受血统论和暴力行为。于是，我们就走向了红卫兵的变异。

说起文革的暴力，总的来讲是人性中恶性一面的大爆发。为什么我们后来的西纠通令当时得到社会各种阶层的拥护，就是因为老同志希望我们保护他，被抄家的所谓黑五类也希望有个政策界限。许多原来的所谓黑五类在城市里，其实身份都已经转换了，可有人还把那个根儿记住了。在红八月的抄家风潮中，街道、派出所协助查老底，查完就动手抄家。很多抄家都是跨学校、跨地区的，通常是在学校附近查抄，谁想抄就抄了，而且夹杂着大量暴力，非常之乱。这是当时社会上普遍的现象，似乎是上层有组织推动的。那时很恐怖啊！我们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儿。

在破四旧已经形成大势的情况下，我希望在学校里大家不要这样对待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并要求我们班的同学和年级的同学，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家庭采取有组织的保护性抄家。我有个同学叫周雪中，他家就住在我家的对面。他学习也很好，我们初中、高中都是同班同学。上学时，我经常到他家去，坐在他家大杂院里的小桌子边一起做作业。这时，我们对他家也进行了保护性抄家，我们去了并没有真的查抄就贴上封条，写上“四中红卫兵已抄过”。并让他们家里人把这些封条保护好，等其他学校红卫兵来时给他们看。周雪中的家就是我亲自带人去“抄”的，而且去的人里还有周孝正！因为我和周雪中的私交特别好，以当时我的地位，我亲自去就表明非常重视这件事。

最近这次同学聚会中，大家还一起回忆了保护性抄家的一些情景。鲁啸威以短信告我：“我仅在抄家时去过许以敬和常悦家，此前没去过，此后也再没去过，因而印象较深。常悦家住在西四一条胡同小院。他的父亲个高大腹便便，母亲瘦小孱弱。到他家后进了他父亲书房，常悦拉开书柜抽屉，里面有许多罐头。于是我们吃了几罐后，四处张望一下，什么也没拿，留下了你给的封条就走了。历时不到半小时。”说起来，鲁啸威、周孝正那时根本就不是所谓的“红卫兵”！

大家还回忆起其他人谁负责“抄”谁家。刘东负责抄黄汉文家，董志雄负责抄金以键家……气氛之平和友好，在充满暴戾之气的当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甚至也出乎我今日的想象。鲁啸威不无动情地感慨：当年那样做了，同学们之间才没有仇恨，才没有伤感情，才能像今天这样聚会啊。

后来我们就规定每个年级支部及早安排好，对于所谓出身“黑五类”的同学，比如说地主出身什么的，都应由本班的红卫兵负责查抄，不准他家附近的其他学校红卫兵插手。那时候，暴力行动非常容易发生。你不去，旁边的什么学校红卫兵可能就来了。当时，四中确实有不少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家，是被自己班上的红卫兵查抄的做法。我不敢保证说，在四中红卫兵对班上同学抄家的行动中，没有发生过暴力事件。但是同班同学去抄家，毕竟有一个情面上的问题，这种方式相对会温和得多。从我们制定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希望保护自己的同学，不要让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去抄。因为那时候如果当地的派出所、街道啊，一旦给红卫兵提供了消息，红卫兵们往往就会采取残酷的方式。我们提出的实际是一种保护措施，当时就是这个心态。但是后来社会上流传的，有点走样。

顺便说一下，对血统论我是很不赞成的。社会上出现由对联引发的一个大辩论，我认为实际上是一种反动。我那时也看了广为流传的“谭力夫讲话”。（10）看完后，我只能说我很佩服他的口才，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但是实在说，讲的道理缺少说服力。他讲的东西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我们党的宗旨、我们党的政策、我们党的发展、我们党的组织构成都不能容纳这个观点。我母亲就是一个官僚家庭出身的人，怎么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呢？我从思想上不接受。所以在这些方面，什么对联辩论等，我们都比较消极。对我们的立场，刘辉宣他们这批人是有意见的。他能即席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谱出曲来，实在是很有才气，我真是佩服。我跟他个人关系很好，但是在四中，还是“政见”不同，我们把他视为“勇敢分子”，他把我们看作“保守力量”。他还编了好几个革命歌曲呢，据说有11首之多。我记得有一个什么“红卫战士响当当”，用京剧的调子谱曲的，当时也是很轰动的。他的才气在以礼平为笔名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得到了展示。我更感谢和重视他在他的口述史中，对我的理性行为所做的高度肯定，尊重他从自己角度对文革的深刻反思。

我不同意对联，也受到了我母亲的影响。因为在这件事上，她曾被毛主席点名批评，这在后面再谈。总之，我在文革初期的思想认识，还是党的政策这个传统观念，尽可能地去保护身边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我们对同学家采取保护性抄家的实质，就是不同意血统论。这和我们之前在学校里建立起来的同学友谊是相关的，没有因为所谓的血统论割裂开。

注释：

（5）“四六八学潮”指1965年“四清”运动中，北京西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部分高级干部子女为主的学生，所发起的一次学潮。这些学生进行了串联，组织了罢课，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主要要求为：一是向中学派“四清”工作组，要求亲身参加四清运动，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二是尖锐批评现行教育制度。三是强烈要求在学生中推行阶级路线，并在学校建立类似于贫协的阶级组织。某种意义上，“四六八学潮”可以被视为红卫兵运动的一次预演。可参阅米鹤都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的有关章节，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编撰者注。

（6）见陈小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史丛书之二，第26页。编撰者注。

（7）据刘辉宣口述，他动手打的是四中校长杨滨。详见后续出版的口述史丛书系列。编撰者注。

（8）对此，编撰者采访了当事者之一的赵胜利。据他回忆当时的情况如下：有一天中午，有人来报信，说出事了！原来是以高一年级为主的一群学生，挨着门把校领导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老师揪出来，要批斗、游街。孔丹当时一下就急了，拿起《毛主席语录》和《十六条》，和部分革委会的人急忙赶过去，一边跑着还一边对我们说：“要因势利导”。到了那里，杨滨等一些校领导和老师已被揪斗。孔丹说：大家不能这样，要有秩序，要按《十六条》办事。要文斗，不要武斗，可以批判但不要动手。当时很快就控制住了局面。但那些同学要求游街，这当时也很难制止。但为保护杨滨，只好由孔丹和周坚两人一左一右地架着杨滨，秦晓和我走在队伍前面开道。我们打掉了一些同学准备攻击校长老师们的棍棒、笞帚、水盆、簸箕（里面装有土），在操场上走了一圈。在这过程中，孔丹、周坚、秦晓和我都挨了打，并弄了一身泥水。回到教研组的院中，在南面一个里外屋，孔丹和我把杨滨搀扶到里屋，和学生们隔离开。孔丹让我一定要照顾好杨滨，千万不能出事。孔丹又去到外屋，给所有被游街的其他校领导和老师做工作，让大家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所有被游斗的人都一一表态，表示要正确对待。我后来就把校医请过来给杨滨检查一下身体，校医看到杨滨一身泥水无法下手。当时杨滨走不动了，我就把她背回她的宿舍，并安排王思敏、彭博文两位年轻女老师帮杨滨清洗干净。校医检查后，说她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我怕出事，还给杨滨做工作：党培养你这么多年，千万不能做对不起党的事，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然后安排两位女老师轮流守护杨滨。到第二天上午，杨滨的精神和

情绪都恢复了正常。

〔9〕据彭小蒙回忆：“八一八”红卫兵上天安门是雍文涛主持安排的。雍要彭小蒙推荐学校，每个学校派20人。彭小蒙推荐了四中、师大女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师院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每校20人左右，总数有400人参加。彭还特意推荐了31中，因为该校红卫兵当初坚决支持她们反工作组。结果31中被错写成13中，31中的红卫兵反而没有人能登上天安门。此外，还有几种关于红卫兵上天安门的说法，可参阅米鹤都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的有关章节，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编撰者注。

〔10〕详见谭力夫口述史“往事莫惊猜”，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编撰者注。

（未完待续）

~~~~~

【春秋史笔】

“贵族学校”的“流氓教育”

——读《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

· 余 杰 ·

北京四中是中国最有名的中学之一，因高干子弟云集而有“贵族学校”之称。在毛泽东时代，北京四中与北大、清华一样成为“红卫兵”运动的策源地。这不是因为四中的学生比其他学校的学生更加聪明、更加革命，而是因为他们大都有身居高位的“爸爸”，他们获得了“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上层政治动向的信息。北京四中的学生不无自豪地承认：“四中的学生成分结构中，有很多干部子弟，但严格说，这里主要集中了干部子弟中的精英。”不过，自诩为精英者，其实不过是垃圾而已。至今，“血统论”仍然是中共的“潜规则”，当年耀武扬威的“红卫兵”头目，大都成为各个领域呼风唤雨的人物，或出将入相，或富可敌国，再度不可一世，叙述历史便成为他们拥有权力和金钱之后又一人生目标。

由北岛等人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一书，由十八位北京四中毕业生讲述了“文革”前夕及前期的人生经历。当然，作者并不全是太子党，也有作为太子党对立面的“遇罗克群体”里的人物，如当时被捕入狱的思想叛逆者赵京兴等人。既然“‘历史性的真实’存在于不同的记忆的重合、错位与对立中”，编者“为了尽量容纳当年不同的视角和立场”，而“特别选举了当年具有代表性或争议性的人物，同时也兼顾不同类型的角色”。不过，因为大多数当事人对四十多年前血雨腥风的历史缺乏诚实的记忆和深切的反省，这本书作为灵魂史和精神史的价值有限；但是，在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层面，它堪称“文革”史不可或缺的横断面。

◇ 恶与恶的激荡

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说法，一切暴政，都从焚书开始，而以焚人终结。希特勒的纳粹运动如此，毛泽东的“文革”也是如此。北京四中多年来追求“卓越教育”，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师资条件和硬件设施，但是，“指导思想”错了，其结果必然南辕北辙。从中共建政起，教育就被当作掌权者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工具，民国教育中至为宝贵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遭到铲除，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成为共产党洗脑教育的核心内容。

“混世魔王”（刘晓波语）毛泽东对文明有着刻骨仇恨，宣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跟他相

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文革”潮起，文明那面薄薄的面纱无法阻挡野蛮和暴力的蔓延。四中学生牟志京惊诧地看到：“南院堆着大量图书馆的书籍被点燃，化作青烟缕缕，升空而去。”在焚书的硝烟中，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这些青少年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变成野兽的，他们“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只等毛登高一呼，便应者云集。刘辉宣承认：“我看出四中教育的症结就是竞争，这是应试教育的根本，优胜劣汰，天经地义。”喝“狼奶”长大的孩子，身上能没有狼性吗？但谁也没有料到暴力如此迅猛地到来。刘东描述了批斗会现场的情形：“批斗大会在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变得有些失控。每个发言都具有煽动性，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群情激愤，不断有红卫兵冲上舞台，抡起皮带，向‘黑帮’们劈头盖脸抽去，台上无人敢制止，台下齐声叫好。打人的先例一开，场面就再难以控制。由于大会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听之任之，甚至鼓励怂恿，致使暴力行为逐渐升级。”

如果说毛是大恶，红卫兵和红小兵就是小恶。大恶与小恶互相激荡，蔚为大观。刘东写道：“有的红卫兵用照相机拍下‘黑帮’的痛苦姿态，甚至示意台上的红卫兵用脚踩在他们身上，手握红卫兵战旗，摆出胜利者的姿态。他们纷纷摄影留念，把这叫做‘把一切牛鬼蛇神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千万双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当时，薄熙来三兄弟都是北京四中学生，薄熙来是红卫兵激进组织“联动”的重要成员。可惜，薄熙来没有为此书撰稿，否则此书将更加精彩——读者也许可以从中找到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灵感来源。

在毛泽东的纵容下，红卫兵攫取了随意拘押民众和使用私刑的特权，成为无法无天的暴民集团。牟志京写道：“校园设置‘小监狱’。……某日，我见有人趴在校长室后窗往里张望，也凑了上去，眼前竟是一排跪在地上的女生的背影。一个持武装带的人，时不时吼叫，那些女生把屁股纷纷抬起来，任他抽打。”另一名学生冯永光也看到相似的景象，昨日书声琅琅的学堂变成阴风惨惨的人间地狱：“四中临时设置牛棚，旁边小屋门口挂着‘刑讯室’的牌子，白天要一个一个‘提审’。从牛棚到厕所百十步远，很多同学手持皮带、柳条枝、扫帚条，在这必经之路两侧等候，抽打羞辱上厕所的‘犯人’。他们几乎全都光着上身，后背伤痕累累，结成血痂。为了少挨几下，他们抱着头一溜小跑。”

◇ 谁在说谎？

这是一本“众声喧哗”的书。在征稿过程中，各位作者都“背对背”写作，并未互相通气，“统一口径”，故而各个篇章之间出现了裂隙、对峙、质疑与颠覆。这正是此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出现了：在截然对立的不同说法之间，究竟哪一种是谎言，哪一种是真相？

比如，刘辉宣说：“在四中，我可能是打人最凶的一个，但做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哪儿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只打过一个流氓。”但是，牟志京却穷形尽相地描述了遭到刘辉宣等人残酷殴打的经历：“为首的那人方脸盘，个不高，但肩很宽，目光凶狠。……话音未落，一拳就向我脸上挥来。……后来才知道，那个为首的就是为‘对联’谱曲的刘辉宣。”本书只收入十八个人的回忆，就让刘的谎言被戳穿，如果有更多受害者开口说话，刘的血债不知会有多厚。

关于四中非法拘押市民和学生的“黑牢”，作为主事者之一的刘辉宣轻描淡写地说：“当时四中也打死了个流氓，死因不明。其余的均无重伤，只是皮开肉绽而已。中国毕竟不是培养职业打手。”恰恰相反，共产党中国就是培养职业打手的大本营，刘本人就是职业打手之一。刘东的记述足以推翻刘辉宣的狡辩：“在四中的劳改队，除了皮带与棍棒的酷刑，外加剃阴阳头，戴高帽，挂重大铁牌，无所不用其极。更可怕的是，一个人完整进去，皮开肉绽出来。据我亲眼

目睹，死在四中小食堂的就有好几个人。施暴者既有四中的也有外校的学生。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以打人为乐。”那些“以打人为乐”的人，不就是职业打手吗？

刘辉宣认为，“西纠”的名声不好，是因为“中央文革的妖魔化”。担任过“西纠”宣传部长的高干子弟秦晓也辩解说：“西纠没有组织过抄家，打人。”但是，唐晓峰指出：“西纠是比红卫兵更激进、更残酷的组织。”王祖镔描绘了“西纠”在六中设置的劳改营的情形：“围墙上拉了电网，备有皮鞭、皮带、棍棒等刑具。关押的主要是校领导、教师及‘反动学生’。”究竟谁在说谎，读者根据常识可作出判断。在此意义上，四中不是贵族学校，中共高官个个是土匪头子，哪有丝毫的贵族气派？四中聚集的，大都是痞子和匪帮的徒子徒孙罢了。

◇ 忏悔尚未开始

红卫兵运动并非自发产生，它始终未能脱离高层权力斗争的影响和控制。秦晓写道，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问红卫兵头目孔丹说：你们红卫兵不能这么打人，把刘诗昆的胳膊都打断了，人家是弹琴的嘛，你们怎么这么过分？但是，叶仍然让他们有事找他。后来，周恩来说，这事不能找叶帅，应该是我做的事。“西纠”的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和相关费用，都由国务院提供。可见，工于心计的周恩来意识到“西纠”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竭力笼络之。

当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发现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西纠”成为保守官僚的马前卒，立即将其打成反动组织。“西纠”的命运如过山车般，从云端跌入地狱。秦晓在一次大型集会上，找到机会将“西纠”的材料转送给周恩来。周立即在讲话指出，刚才有人给我递来关于“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看过。对于周的矢口否认，秦晓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们都觉得出于政治上考虑，保护周总理，就没再说什么。后来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由此，“被利用”成为当事人拒绝忏悔的挡箭牌。为“血统论”谱曲的刘辉宣认为，共产党历来就有用糙话阐释政治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比如‘枪杆子里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类山寨版的马克思主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套话语的延续”。他的言下之意就是：既然毛泽东可以这样干，作为“毛主席的儿孙”的红卫兵为何不能这样干呢？

关于红卫兵的暴行，刘辉宣振振有词地辩解说：“红卫兵有过非常过激的暴力行径，这是错的。但是我们看到当今的世界，看看那些群众性暴行，相比之下，当年红卫兵的‘暴行’可以说是够克制、够文明的。”他的灵魂足够坚强，不会因为当过加害者而良心不安。只要世界上有比他更坏的人，如萨达姆、本拉登和卡扎菲，他就可以心安理得。由此可见，当毛的罪孽未被全面呈现和有效清理，期望红卫兵群体首先忏悔是不可能的。

不尊重他人的生命权的，不是贵族，而是流氓。一直致力于研究文革受难者的学者王友琴指出：“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各省各部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印发了表彰红卫兵‘功绩’的材料《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项，是红卫兵在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在那样的文件上，受难者只有数字没有名单，不会是因为要隐瞒他们的被害，而是显示了对他们的生命的轻蔑。”所以，我们需要找出每个受害者的名字，然后找出每个加害者的名字。从毛泽东到刘辉宣，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流氓，对他们的追究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历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

□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

## 【不堪回首】

### 评“青春无悔”

• 裴毅然 •

作为一代人，红卫兵一代正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当各行各出现一张张日益年轻的新面孔，当各种可能与机遇与他们渐行渐远，他们清晰意识到历史正在邀请新一代人入席。学历、文凭、外语、电脑，这些新时代的入门券，他们一样也没有。从时代机遇角度，他们确为最倒霉的一代：该发育时吃不饱饭、该读书时赶上文革、该恋爱时不懂爱情、该有钱时却下岗了，历史对他们太不公正。他们是被剥夺得最彻底、嘲弄得最悲惨的一代，已经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新时代的处理品”。一位属于这一代的上海师大教授总结：我们这一代，童年要长身体，碰上三年自然灾害，没得吃；少年时代要读书，碰上文革，没得学；青年时代要进入社会，碰上下乡，没得路；后来要回城了，碰上知识化，没有文凭；社会转轨，碰上下岗；进入中年身体多病，碰上医改，要自己掏钱；最后，快到老年了，碰上房改，没得钱。我们这一代最倒霉，不能升学、不能就业，又吃不上大锅饭，从下乡走到下岗，尽赶在时代的凹陷处。（1）

然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许多老红卫兵呼出“青春无悔”的口号，一位老知青这样自我评价：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伟大的一代。这可不是自我安慰嘛的。当时，“文革”把国家经济搞成那样，几乎崩溃，我们要是不下去，两千万人会给城市造成多大的压力。尽管我们受骗我们受苦，但我们支撑这国家大厦几乎坍塌的一角，是吧？应当说，是我们承受着“文革”造成的恶果，就是我们这代人。可是至今对上山下乡一起没有一个正确的估计。（2）

知青诗人李松涛说：“反思历史，无论心绪多么的复杂，有一条始终是明确的，我从不以控诉的态度对待往昔。对于知青岁月，我则报以永恒的感激。那段时光决定了我的现在，也决定了我的将来，让我受用毕生。”（3）另一位知青：“整整十年的农村生活，是人生最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度过的，是最有价值的十年。十年没有虚度，十年学到了很多很多……如今回想起那十年，我无怨无悔，这是我一生中最充实的十年。”（4）还有人为那些因婚恋被迫留下的“留守知青”寻找崇高：“在知青大返城的潮流中，他们能悲壮地守住自己的诺言。”（5）“留守知青”说得最多的则是：“如果那些知青不返城的话，那该有多好。”（6）

“青春无悔”似乎成了知青一代的主旋律。1998年出版的一套《广阔天地备忘录》丛书，分别以《无悔年华》、《岁月留痕》为名，内中140篇文章，几乎无人认识到上山下乡本身的巨大灾难性，还停留在自我回忆的感叹与陶醉中。这百余名无疑具有代表的老知青，至今还意识不到这场人为制造的灾难给数代国人带来的遗祸，而且最最倒霉的还是他们自己。这使我不得不深深意识到阿Q悲剧的深广性。

那位老知青以支撑国家坍塌的经济、承受文革的恶果为索要“正确估计”的筹码，自封“伟大的一代”，依此逻辑，那么承受庚子之难、抗日战争的那几代，难道就不是“伟大的一代”？站在荒谬的地基上，以承担完全可以避免的苦难为压秤法码，要求历史的“正确估计自己”，只能说明这些老知青本身的价值迷失与思维混乱。道理很简单，“支撑国家坍塌”、“承受文革恶果”这些附带效应无法代替掩盖整体错误。因为，在支撑国家经济坍塌的同时，也摧毁了现代化与知识化的捻儿，致使整个国家朝着历史发展的相反方向运行。

难道只要将理想的大旗一招展，那一切血泪、一切残忍、一切荒唐难道就能改变意义么？

“青春无悔”难道还不是最基本的逻辑与价值定位出了问题？从相当意义上，“知青情结”极大地阻碍了他们超越自身认识的局限，使他们无法理性地评判那一场运动。事实上，只要永远用知青的眼光去看待那一段历史，只要还在使用知青时代的思想武器，即只要还处于知青思维体系的控制之下，那么红卫兵一代就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悲剧，而且是最完全意义上的悲剧。

怀揣“无悔”之情，还能进行什么有深度的反思？个人的怀旧伤感遮蔽了老知青们的理性思考，阻止了他们从历史高度省视这场“红卫兵—上山下乡”大闹剧。我们怎么能够因为身在其中就如此弱智弱视如此自欺欺人？许多当年的红卫兵从个人经历与情感出发，而不是从全局高度出发审视红卫兵运动的反动性，不时要求社会对红卫兵运动重新评价，企求予以局部肯定，不满于后人归类于希特勒纳粹冲锋队：“想起文革，说老实话吧，我不后悔，我可以忏悔，但我不后悔。因为当时我们不是怀着卑鄙目的参加的，当时正经八板当革命来对待的。……一场战争指挥错啦，战士死了就不算烈士？”〔7〕对这样无法分清局部与整体的怀旧者，确实需要从头论起，即需要给他们上上最基本的价值观课程。

知识底座的狭窄、使用逻辑的混乱、衡量标尺的倒持，使他们无法进行宏观反思。事实上，如果将那些武斗死难者也追认为烈士，那么就必须承认武斗的正当性，接着也就必须承认文革的正确性。否则，武斗死难者何以成为烈士？如果不是为了正当的社会利益而死难，其“烈”何在？凭什么去肯定他们行为的英勇性？错误路线、荒谬行为的死难者，他们的专用名词只能是“炮灰”与“牺牲品”。这也就是为什么不能承认死于二战的纳粹与日寇为烈士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不反对日本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的核心理由。

虽然从情感上，我可以理解这些老红卫兵的“知青情结”：青年时代短暂的激扬已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值得留恋的火炬，所谓“青春无悔”其实是留恋那青春风流，那一生中惟一可资回忆的辉煌，为什么还要剥夺他们这一点可怜的自慰呢？为什么硬要戳刺他们最痛的伤口呢？为什么不能宽容一点呢？为什么不能……然而，如果仅仅是个人的伤感、个人的自慰，确实可以放一码，可以让他们找寻这一点自迷自醉，这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人不可干涉的自由。但问题是他们要将这“青春无悔”上升为集体记忆，要求对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的整体价值有所肯定，从而有可能动摇对文革极左思潮的彻底否定，为那一场从起因到结果都完全开了历史倒车的运动，寻找一点所谓历史价值，而这一步是无法退让的，无法宽容的，不能仁慈的，不能允许的。毕竟，个人行为的无可指责无法代替整体的荒谬，个人的牺牲无法弥补整体的错位。历史是无法照顾个人伤感的，也不可能根据当事人的眼泪改变价值定位。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政治民主，需要国家事务决策的民主化，其目的与意义正在于最大限度地杜绝这种整体荒谬，及时纠正政治领导人的各种偏误，绝对避免积小误为大错，绝对避免再发生第二次文革。

注释：

〔1〕杨剑龙：《我们这一代中年人》，载《杂文报》2002年2月22日。

〔2〕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首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51页。

〔3〕信群主编：《岁月留痕》，沈阳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55页。

〔4〕信群主编《岁月留痕》，沈阳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57页。

〔5〕朱晓军：《大荒羁旅——留在北大荒的知青》，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2页。

〔6〕朱晓军：《大荒羁旅——留在北大荒的知青》，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4页。

〔7〕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首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228—229页。



~~~~~  
【往事非烟】

辽阳十年

• 谢定国 •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北大数力系62级力学专业毕业分配，我被分到了辽宁省辽阳市汽车弹簧厂。分配方案一定，我马上打电话问家里要了二十元钱，匆匆忙忙买了一个人造革旅行包和一些最必要的日常用品，把大部分的书籍当废纸卖掉，带着最简单的行李，以及北大军宣队工宣队签发的红通通的“新北大”毕业证书，犹如漏网之鱼，逃离了北大。在阶级斗争的锣鼓，由慢到快，由轻到重，一阵紧似一阵的年月里，我被多次提醒：我是在一九六二年，被错误的修正主义路线招进北大的，我这种出身是没资格读北大的。我在毕业前还刚刚被批判过，暗暗庆幸能全身而退，而且还有一个正规的单位可去。这就是我当年离开北大的心情，对未名湖，对燕园，并无眷恋之情。同学之间，也因为派性未消，戒心很重，跟本没有那种合影留念，相互题词，离意浓浓，恋恋不舍的场景。在那个年代，同窗之谊，师生之情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是革命不允许的。

我尽管是读理科的。但一直喜欢文史哲学。在一、二年级数力系功课最忙的时候，都坚持课外阅读。文革时学校停课，我更是有空就跑馆藏丰富的北大图书馆。读马恩列斯，读共产国际的史料，和一切我能借到的感兴趣的资料。也读当时在同学间流行的灰皮书等内部出版物，如“第三帝国的兴亡”等。我借读过一九五七年全年的北大校刊，知道一个物理系的同学叫谭天荣，在反右运动已经全面展开，右派分子的帽子满天飞的时候，他还在大饭厅贴出大字报，骄傲地宣称“右派分子”是历史赋予他的桂冠。我知道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等一批知识分子在一九二七年曾对时局发表宣言，这被当时的共产国际定性为资产阶级背叛第一次大革命的标志性事件。我读到列宁遗嘱中对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的评价，知道列宁在遗嘱中对斯大林有所保留。斯大林的俄文意思是钢铁，他的性格也和钢铁一样坚强和无情，所以在党内斗争中战胜了托洛斯基。我也知道在纳粹德国，青少年也经常有组织起来，进行长途行军，接受纪律严明的准军事训练和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教育，与我们的红卫兵运动类似。在一次政治学习的休息时间，我不经意的和一些同学分享了这些信息，但不幸被人向工宣队告发。

我至今不知是谁告发了我。我在北大文革时，曾以扬子浪的笔名，写过一些大字报，自问派性不是很严重，也不参加武斗。那位告发者，不太可能是出于个人恩怨，很可能是觉得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当时，正是分配前夕，在这个关键时刻，被人告发，真是情何以堪！我只好在班上，心情沉重地做了几次检查，之后，工宣队居然放过了我，没有做进一步的追查。我一直认为是当时的班长向世明同学保护了我，为我在工宣队前面讲了好话。他在事发后，找我谈话时曾安慰我说“你，还有李重庵同学，尽管出身不好，但表现一直不错。”我相信他对工宣队说的是同样的话。我十分幸运，我写的检查似乎没有入档，毕业分配最后也没有受影响。向世明同学分到上海沪东造船厂，后来又去了深圳光明农场。毕业后一直未能再见，如向世明同学有机会看到这篇小文，我谨借此机会向你表达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辽阳汽车弹簧厂隶属一机部，是一个有七八百职工的中型厂，有两个车间组成。一车间是从长春第一汽车厂搬迁来的。设备相对先进，但也是前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从美国引进的技术，五十年代仿制后再援建中国的。二车间则是当地一个小厂发展起来的，设备落后，无流水生产线。汽车悬挂弹簧的生产，由钢板切割，冲孔，热处理，喷砂，装配和喷漆等工序组成。在二车间，这些工序全部靠人工搬运连接，大量的劳动浪费在搬运这些沉重的半成品上。这一

年，分到辽阳汽车弹簧厂的大中专学生，有一百多人，其中三十多个是一机部高校如北京机械学院，上海机械学院等分配来的，再加上北大，清华各一人。这些学生全部被分到一，二车间的生产第一线。分到一车间的兴高采烈，分到二车间的则自认倒霉。其实板簧生产整天和钢板，高温油烟打交道，烟熏火燎的；无论是一车间，还是二车间，生产条件都很差，劳动强度都很大。一车间有生产流水线，用力较少，但节奏快。二车间靠人力搬运，用力大，但节奏不受机器控制。我则被分到二车间的喷漆工序。北京机械学院的一位同学开玩笑地说：“哦，你是学流体的，分配去喷漆，正好专业对口。”

二车间喷漆班，共有三名女工，连我算上六名男工。六名男工分两组，把已经装配成型的汽车弹簧，每天平均500个左右，每个约50公斤到70公斤，用手推车一车一车的从装配工序推到喷漆工序，然后再抬上喷漆架，由三名女工喷漆。喷漆完毕后，再通风干燥。我们再把板簧，搬下喷漆架，用手推车搬运到成品库。这种重体力劳动，我大约干了五年左右。我当时年轻，不知惜力，后来得了肾虚的毛病。中年以后，在浙大教书，因为静脉曲张，不能在讲台上久站，后来只好动手术抽调了右腿的一根静脉。这也应该是在那时候推车过分用力的后果。静脉曲张通常是黄包车夫的职业病，大学教授一般是不会得的。

我从中学开始就喜欢哲学。同年龄的中学生，觉得枯燥无味的哲学书和哲学史著作，我能看得津津有味。报考大学时，本来是准备报考北大哲学系的，后来被我舅舅强力劝阻，才改考了数力系。我舅舅深知在那个年代，搞哲学不但不能作为职业追求，更可能带来无数的麻烦，特别是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我为此感谢我舅舅一辈子。我尽管放弃了哲学作为我的专业，但哲学的思考，或者叫胡思乱想，则在当时并没有停止。我在工余休息时，穿着满是油污的黑色工作服，口鼻呼吸处则镶着一层闪亮的黑漆，半躺半瘫在休息室的土炕上，经常会不由自主的想起马克思的一句话：“哲学家和搬运工的差别，远要比人和猿的差别来得大。”我自衬，我这个半吊子哲学家，怎么就和搬运工合二为一了呢？！这难道也是文革空前绝后之处？

在那些最绝望最苦闷的日子里，大约是一九七二年，我给学校数力系的段学复教授写过一封信。在信里，我诉说了自己的苦闷，询问将来能否有一天，我们这些学生能够专业对口，学以致用。段学复教授是数力系的主任，是中国代数学界的权威。他颀长瘦削的身材，戴一副玳瑁边的深度近视眼镜，按照当时的文革标准，是一个活脱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我是流体力学专业的，段学复教授从来没有给我上过课，也不会认识我。但他还是用北京大学的直式信封，直式稿纸，用毛笔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在当时那个情况下，他不可能许诺什么东西，或给予任何具体的帮助。但他两页纸的回信，浸透着真正北大师长对学子的关怀，温暖了我的心，让我感受到了依稀希望。我曾长期保存这封信，但可惜最终还是在不断的搬家遗失了。我也曾希望，什么时候，能回学校当面感谢段学复老师。但世事繁忙，直到段学复老师2005年谢世，我都没能实现这个愿望，留下了终身的遗憾。段老师在信中讲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更重要的是他对学生的关爱，和书信的民国格式。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力量，足以抗衡两报一刊，连篇累版的文革文字。

分到辽阳市的北大同学，只有我一人。但我一直和很多北大同学保持着长期的通信关系，如中文系的黄虹坚，历史系的王复兴和化学系的陈双基等等。在那个黑暗苦闷的年代，同学之间的这些来往书鸿，是荒漠中的甘泉，给我们这些哭泣的心，带来了无限的慰藉。也为我们传输了最新最快的政情动态。记得林彪九一三出逃，丧命温都尔汗；四人帮垮台，都是历史系的王复兴同学提前在基层传达前很多天写信告诉我的。当辽阳弹簧厂的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召开全厂大会，为全体员工传达关于林彪出逃的中央文件时，他神情紧张，语调混乱，每次读到林彪时，都犹豫不决，似乎不敢直呼其名。而我呢，因为有北大通讯社的先发消息，早已心定气顺地，坐在远处，欣赏他的狼狈样，并暗自思忖，他们这些穿黄军装的大概很快就会离开工交系统了吧。

在辽阳的那些年，伙食很差。东北天寒地冻，很少新鲜蔬果。常年的副食是白菜土豆。主食则是高粱米，玉米粉，再配以部分大米和面粉，全是凭票定量供应。此外每个月还凭票供应有一，二斤肉，食油则是三两。全国各地其他省市食油供应都是五两，因此我们为当时的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陈锡联起了个外号“陈三两”。随着革命狂热，从上到下，渐渐退潮，分到辽阳弹簧厂的同学们开始注意生活问题了。除了谈恋爱，找对象，就是自己开小灶，改善伙食了。当时学生们烹调烧饭用的炉子，都是利用工厂的边角余料，自制的煤油炉。煤油当时属特殊供应，市场上根本无货。因此我们这些学生工人，经常从车间里往宿舍捎汽油，代替煤油烧饭做菜。有时烧着烧着，整个炉子就起火了。大家也都毫不吃惊，能从容处理，通常用一块厚抹布，把火扑灭。但这种汽油做饭的创举，和文革一样，不是常态，早晚都要出事的，套句时髦语，是不可持续的。

工厂的单身宿舍楼是一栋两层的砖房，每层有公共厕所，但无公共厨房。上下两层，大约有三四十间单间。每间一般住四人，两张双层床靠窗摆放，邻门一侧，则放一张桌子和其他杂物。我住的那间单间，在一楼，住着三个人。一个是上海机械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姓陈，苏州人。另一个是当地的青工，沈阳一间高中毕业的小赵。陈苏州当时正在积极活动，要调回苏州去，解决夫妻两地生活的问题。当时，整个调动程序已经有了一些进展，让他充满了希望，期望有一天可以重回江南水乡。出事那天，陈苏州刚好收到一封家信，告知他调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苏州的接收单位，至今也没收到辽阳弹簧厂已经寄出的档案。午休时，他丧魂落魄似地回到宿舍。但仍像往常一样，开始点煤油炉，准备烧挂面做饭。我当时已经坐在临门的桌子上吃饭，炉子则在门和桌子之间。他用火柴点炉子，点了几次没点着，知道是没油了。因此打开炉子底座的油罐盖，准备加油。油罐打开后，残存的汽油液面，接触到充分的空气后，开始燃烧。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用煤油炉烧汽油做饭时，经常发生。通常盖一块破抹布，火就会熄灭。然后，加上汽油，盖上油罐，就可继续做饭。但陈苏州因为调动受挫，魂不守所。再加上他又是一个热处理工，可能见惯了滚滚炉火，竟然拎起我从班上捎回来的半桶汽油就往已经着火的油罐上加油。我当时目睹这一切，不禁厉声大叫：“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紧接着就“砰”一声爆炸，我整个人就不由自主地被气浪一下冲到房间另一侧的窗口边，只见整个房间靠门一侧，大火熊熊。出于求生的本能，我右脚已经踩在了窗台上，只要两脚一跳就可逃离火场。人在这种突发的紧急关头，肾上腺素和各种激素大量分泌，精神和体力上和平时完全不一样，是一种非常状态。没有经验过的人，很难体会。我当时想得很多，想得飞快。我想到，我如跳窗逃走，整个宿舍楼就会起火。我又想到尽管肇事的是陈苏州，但汽油是我从车间捎回来的，我和他都有责任。在我的脑子里还出现通常只有在做梦时才会有的照片一样的一张张画面。我见到大楼被烧成断垣残壁，但仍然余烬缭绕。我见到陈苏州和我站在台上低着头挨批判，台下则是黑压压的一片工人群众。我当然不能接受这种结局。同宿舍的小赵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也站在窗台上，但我根本看不到他。他说我当时大喊了一声“不好！事情要闹大。”就冲回去了。我自己已经不记得讲过这句话了。我当时就抓了一条被子，还责任分明地先抓了陈苏州的被子往炉子和油桶那个方位压了上去。紧接着又抓了自己的被子再压上去。小赵也用了自己的被子向余火压了上去。这时隔壁房间的各位同学，工友听到这么大的动静，也纷纷赶来救火，总算把火扑灭了。

因为扑救及时，火只烧坏了一些家具和衣物。小赵和我的脸部三度烧伤，局部二度烧伤。陈姓同学因为靠近门，爆炸的气浪可能把他冲出了门。等他拿着把铁锹回来时，火已经灭了。我和赵都送辽阳市市医院治疗。后来在脸上敷了一层厚厚的黑色中药，两三周以后才拿下来，居然也没留下疤痕。事情当然瞒不住，后来陈苏州在全厂大会上，受到点名批评，小赵则受到褒奖。我因为首先奋起救火，功过相抵，既无批评也没表扬。

但事情过后，我约略感觉到一起分来的大中学生对我多了一分敬重。以前大家只知道，谢

定国是北大毕业的，书生气浓，好学深思。现在也知道北大同学在紧急突发关头也是有快速反应能力的。我自己也把这次救火行为，列为我人生最值得自傲的事之一。实际上也是影响我人生的重大事件。如果这次失火成灾，我人生的轨迹可能完全不一样了。

作为喷漆班的搬运工，尽管劳动强度大，但有一个好处，就是休息时间也长。在女工喷漆时，我们可以休息。喷完后，入库前，新漆需要通风晾干，这段时间我们也可以休息。工人师傅们就会利用空闲，侃山海经。他们天南海北地讲辽阳当地的各种往事轶闻。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军纪败坏，我就是从他们的闲谈中听来的。

但更多的时间，我用来自学英文。一本袖珍英汉字典，几年下来，被我因劳动脏污的手都翻黑了。从一九七一年开始，中美关系逐渐解冻，在市面上已经可以找到一些外文的出版物了。我每次回上海探亲，都要去外文书店好几次。外文书店公开的门市部，销售的是毛泽东著作的各种外文译本，各种外文文版的北京周报，和可怜的只有几种的进口的外文报纸期刊。我记得当时有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新西兰共产党（马列）出版的英文报纸。我就读他们的报纸学英语，比教科书上的“Long Live Chairman Mao!”强不少。但我那时去上海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主要目标是后面弄堂里的内部书店。内部书店，另有隐秘入口，要凭工作证登记后才能进入。店里全是由低劣纸张翻印的各种外文书籍，以科技书籍为主，也有一些文史和语言学习方面的书本期刊。

我先是读一些简写本的英文名著，如狄更斯的“双城记”，“大卫·科珀菲尔”；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等。这些出版物，通常无出版日期和出版机构，但在末页，不显眼处，标有“内部交流”四字。我读的第一本英文正本的小说是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我还记得读小说的第一页时，就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生字，书上密密麻麻都是我写上的注解。我知道所谓的“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全是胡说八道，没人会相信这种鬼话。我们喷漆班中那些识不了几个字的老工人，每当我埋头读书时，都会把聊天的音量降下来一点。我当时选择苦学英语，一是觉得英文肯定有用，而且比专业知识更容易派上用场；二是在这种英文经典读物中，我能深深感受到文学的力量，激励自己，奋发图强，并丰富和涵养自己的情感世界。

尽管没有老师的教学和同学间的砥砺，靠着在北大学了半年英文的基础，通过几年苦学，我的英文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这为我作为英文书面翻译，从辽阳弹簧厂调到建设中的辽阳石油化工总厂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一九七一年，林彪坠机温都尔汗后，中国的政局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建设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周恩来总理不动声色的运作下，慢慢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国家计委决定从国外进口八套化肥生产成套设备，和三套大型的化学纤维成套设备。其中一套大型化学纤维成套设备就选址在辽阳市。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要报送毛泽东的审批，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伟大领袖，连同意两个字都懒得写，只是画了个圈，表示看过了。当时的辽阳化纤总厂工地，到处都是伟大领袖挥手引领工人前进的巨幅宣传画，口号则是“毛主席圈定我施工，建设辽化多光荣。”

三个化纤项目是自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大型项目后最大的进口成套设备项目。为了筹备建设，辽宁省从五七干校调回了大批老东北局的干部和北外，北二外在辽宁农场锻炼的学英语，法语的大学生。此外，还从全省抽调技术干部和外语人才。我的太太从抚顺石油二厂调到化纤总厂的研究所工作。我则以英文书面翻译的职位调到总厂外事处的合同科。负责翻译英文的合同文件，来往信函，并作为会议记录参加中外双方每周一次的工作会议，并负责整理会议记录。

辽阳石油化工总厂是一个从原油加工开始，到制成各种合成纤维的综合大型企业，建设期

很长。七三年，我刚到辽化时，厂部还在厂区现场动迁农民留下的几间平房内办公，到我七八年离开时，石油加工部分已经试生产，但化纤部分仍在建设中。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参与项目的对外谈判工作。辽化对外谈判的总代表，随着政潮的起落，换了好几个，最后一个是老北大工学院毕业的，东北石油系统的权威，好像姓张。张总，在得知我也是北大学子后，眼神里充满了对同校后辈的关爱。后来，我在浙江大学力学系执教，张总来校访问时，我还接待过他，可惜，我现在却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北大的校友，很少分到机械工业和化工工业的，张总，是我在辽阳十年中，碰到的唯一一位校友。

外事处合同科的工作，既要求懂技术，又要通英文。当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青年大学生不多。学化工的，一心想做专业的技术工作，学外文的则希望多些口译的机会，将来好出国考察。因此我得以长期在这个一些人看来很重要的岗位上做下去。当时外事处的一个副处长，向我透露：有人反映，外事处这么一个机要单位，为什么要用出身不好的人。她告诉我处里的领导顶住了。她这么做，自有笼络的意思。但我心里明白，要找一个合格的替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也清楚，不管我多么努力，以我北大数力系毕业的背景，在这么一个化工企业中，是不太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的。

一九七八年，全国高校恢复招收研究生，得知消息后，我马上利用下班的业余时间准备应考。在校时，我们62级的流体专业，一九六五年秋季学期，刚刚开始学流体力学，一二个月后，就停课到四川搞四清去了。但考试科目中，有流体力学，因此三四个月的准备时间，我主要用来自学流体力学。另外利用两周的时间复习物理。对数学和英文，我胸有成竹，没用任何时间准备考试。临考时，离我学习高等数学，已经有十来年了，期间也没有什么应用和复习。但当时的感觉是微积分，代数学全在脑中，自己有能力，不用任何参考材料，可以写出一本微积分的简明教材来。当时在北大教我们微积分的是冷生明教授；教我们解析几何的是程庆民老师，他是右派份子，同时又是才华横溢的小说作家；教我们高等代数的是丁石孙教授，也曾被授予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桂冠。是这些老师，把数学力学，把其中的科学精神，把好学不倦的品德传授给了我们，让我们一生受用。多年后，当我那个在贝克莱加大读书的孩子，拿着他的得A的高等数学考试试卷，向我炫耀时，我告诉他，你这种水平，在北大勉强得个3分吧。

我顺利地考上了浙江大学力学系郭本铁教授的研究生。一九八一，我又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公费留学生名额，赴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攻读博士学位。一九八五年，我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留美学成归国的博士之一，回国服务，在浙江大学执教。人民日报北美海外版还为此刊登了消息。

我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还遇到了一些起伏顿挫，但北大传承给我的独立自由的精神，科学民主的信念和不甘平庸的追求，护佑着我走过了人生的一切坎坎坷坷。在每个北大学子的心中都有他自己诠释的北大。我的北大，是那个洗掉历史铅华，脱下权力盛装的北大。是源远流长，学养深厚，自由独立的北大。她不仅仅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她也在台北台大的校园内，在哈佛燕京学社里，在安徽安庆陈独秀墓园，在苏州灵岩山麓，在一切有北大精神的地方。我们的北大，不仅是中国的北大，也必将是世界的北大!!

（此文经删节后在《告别未名湖（2）—北大老五届行迹》一书中刊出。这里刊登的是未删节稿。）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